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测度与多元影响路径 ——以昆山市周庄为例

孙佼佼^{1, 2} 郭英之^{2, 31}

(1. 苏州科技大学 商学院, 中国江苏 苏州 215009;

2. 复旦大学 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中国 上海 200433;

3. 复旦大学 旅游学系, 中国 上海 200433)

【摘要】: 研究探索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元路径, 为促进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思路。文章综合质性与定量方法, 采用扎根理论、量化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探索多变量交互作用。研究发现:(1) 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包含3大维度, 最终可提炼包含10个题项的测量量表。(2) 在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和经济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 单项要素中的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一致性相对较高, 但都不能构成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充要条件, 必须通过组合路径发挥作用。(3) 在形成的64种路径组合中, 有10个充分性条件路径组合能有效影响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4) 10条路径组合共产生了3大类解释力由高到低的逻辑, 依次为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5) 旅游地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在关键路径中扮演核心作用, 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来说, 其积极情感的生成超越经济要素的满足, 更需优化参与机制和提升情感联系。(6) 乡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生成不依赖单一要素, 管理方要因因地制宜选择组合路径。

【关键词】: 居民积极感知 测度 多元影响路径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古村落 乡村旅游 地方依恋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8-0213-09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与依托^[1], 随着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用日益明确, 其带来的“人”的感知效应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点。乡村旅游发展在根本上应以人为本, 落脚于人的感知^[2]。东道主居民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在旅游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长期作用于目的地居民的背景下, 居民心理体验和态度反应形成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这种感知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也是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核心指标。

目的地居民的积极感知能够提高居民满意度、社区认同和旅游业支持度^[4], 对个体幸福感与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孙佼佼(1989—), 女, 陕西咸阳人, 博士(后),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空间、城市旅游。E-mail:sunjiaojiao1028@163.com; 郭英之(1964—), 女, 河北张家口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E-mail:yingzhig@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225、7207405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21YJJCZH1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1M690652)

在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居民收入和心理成熟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居民积极感知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其来源和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因此，研究从早期关注经济感知^[5]开始扩展至情感、人地关系和社区等诸多层面^[6]。但当下，我国对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和测量多借鉴国外研究，且主要从不同的单因素路径探讨人地关系要素对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基于我国实践进行的原生性本土探索还比较缺乏。

因此，古村落的旅游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具本质化与系统化的问题：在旅游过程中，居民的积极感知究竟有何内涵？不同的要素如何单独或组合发生作用以影响居民积极感知？在这一背景下，为探索居民积极感知的内涵与测量，分析其影响因素形成过程，本文综合使用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探索性和验证性量化分析，以及兼具定量与定性特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要素的交互作用，并结合案例解释不同要素的多种路径组合。一方面建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构成和测度量表，另一方面在以人为本的新型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影响居民积极感知的多元路径。

在理论层面，目的地居民感知相关研究在国外开始于 1970 年代，早期理论包括 Doxey 的愤怒指数^[7]、Butler 的旅游地生命周期论、Ap 和 Perdue 等的社会交换论等较为宏观的理论^[8,9,10]。国内的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始于 1990 年代陆林对皖南旅游地的居民态度进行的调查^[11]。当下国内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主要是对旅游发展客观状况感知的类型化分析，例如经济感知、环境感知、效益感知等^[12]。虽然居民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重点领域，但目前体现为不同因素的单独分析，且不同研究选取的要素各有侧重^[13]。在乡村旅游发展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需要对不同要素的综合作用进行路径化探索。

具体影响因素上，居民地方归属感是个体对特定地区的情感投入和依恋^[14,15]，居民的地方归属感对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有助于群体利益获得感^[16]；居民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长时间保持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17]，能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感知^[18,19]；感知权利是居民感受到自己能对当地旅游发展产生影响的程度，会影响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的感知并影响其支持度^[20]，Rasoolimanesh 等从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2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知识的掌握程度会影响其参与行为，也会影响其对当地旅游发展影响的判断，从而对积极感知产生影响^[22]；居民参与在行为和制度层面影响居民积极感知，居民参与旅游程度越高越满意^[22]，越会生成积极感知^[23]；此外，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是影响居民积极感知的重要传统因素，乡村旅游对增收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和累积效果^[24]，居民收入对旅游业依赖越强，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13]。以往，不同研究关注特定单一要素的影响，但现实中，不同要素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不同的要素组合产生不同结果，因此需要对以往分散研究中的单一要素进行系统化、组合化分析。基于以上，本文从居民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以及经济依赖出发，分析单因素及不同要素构型对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周庄位于苏州昆山境内西南 33km 处，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近年来推行以田园综合体为代表的乡村休闲旅游模式，践行“一村一品”的旅游产品理念，周庄乡村获评“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周庄旅游发展的特征在于居民生活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性，在推进旅游项目的同时，兼顾民生工程。2019 年，周庄接待游客超 400 万人次，旅游从业人员逾 6000 人，本地居民占比 70%以上，形成原住民、新创客、旅居者共建共享的居旅共存模式^[25]。2020 年下半年，周庄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配合国家政策，推进线上线下综合营销模式，促进旅游市场有序重振，成为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恢复的典型。因此，选择周庄为研究案例地具有代表性。

1.2 数据采集

本文数据采集方式包括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分阶段采集质性数据与量化数据，进行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探索、

题项验证与影响路径分析。数据采集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调研时间为2020年7月2日—8月2日，访谈方式为线下实地访谈和线上访谈（以微信和QQ为主）结合。共访谈居民32名，其中女性和男性各16名，年龄区间为24~73岁，人均访谈时间为25~45min。访谈后将录音转译为文本资料，初步处理后共获得67202字的质性文本，为基于扎根理论的居民积极感知维度探索奠定基础。

数据采集第二阶段为2020年8月20—30日，本阶段在案例地面向居民发放问卷，共发放260份，回收245份，有效问卷229份，有效率93.5%，旨在对基于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维度开发的题项进行验证，确定居民积极感知量表。问卷的主要内容包两部分，一是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二是居民积极感知测度，题项采用Likert七点尺度加以衡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1~7的分数，由受测者在相应的数值上打分。

数据采集第三阶段时间区间为2020年9月16—30日，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5份，有效问卷163份，有效率83.6%。问卷共包含7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居民地方归属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22]、McCool等^[15]和杜宗斌等^[16]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居民地方依恋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22]和Nicholas等^[26]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为居民权力感知量表，主要参考韦瑾等^[20]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为居民旅游知识量表，主要参考Rasoolimanesh等^[21]的研究成果；第五部分为居民参与感量表，主要参考王纯阳等^[22]的研究成果；第六部分是居民积极感知量表；第七部分为个人相关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平均月收入、婚姻、居民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度等信息。样本结构方面，女性受访者的比例略高于男性；41~50岁之间的受访者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在本地居住超过20年以上受访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其它比例；受访者的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

1.3 研究方法

1.3.1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与量化题项开发

1960年代Glaser和Strauss关于扎根理论的著作^[27]奠定了经典扎根理论的基础，此后的Corbin和Charmaz等人又创立了程序化和建构性扎根理论学派。经典学派更适合分析微观的社会过程^[28]，在旅游研究中被广为使用，被视为最适于理论建构的方法^[29]。扎根理论并不从研究假设出发，而是在研究开始之前进行理论悬置，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的三阶段过程，从基于本地生成的、原始的实证材料中逐步生成概念和理论。因此，为探索能够精确适用于我国乡村旅游本土实践的居民积极感知维度，本文第一阶段选取扎根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居民积极感知的测量题项开发。

1.3.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能够对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进行深入挖掘^[30]，该方法并不将各条件变量视为分离的影响因素，而是分析其以组合方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路径，能够挖掘出对结果变量有解释力的多元要素组合^[31]。本文研究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属性较为复杂，因此适合运用此方法，按照不同隶属程度建立参数，最后建立真值表探究因果关系。fsQCA通过布尔代数的计算方法，解释参数选取一致性和覆盖率作为判断标准，参数解释如下：

①一致性。一致性用以判断条件构型的因果关系程度，即结果事件Y的产生与对应多项原因事件X组合的一致性程度^[32]，公式如下：

$$\text{Consistency}(X_i \leq Y_i) = \frac{\sum \min(X_i, Y_i)}{\sum X_i} \quad (1)$$
$$(0 \leq \text{Consistency} \leq 1)$$

②覆盖率。覆盖率指标 (Coverage) 被用来判断条件 X 对 Y 的解释力度^[33], 其公式如下:

$$Coverage(X_i \leq Y_i) = \frac{\sum \min(X_i, Y_i)}{\sum Y_i} \quad (2)$$

$(0 \leq Coverage \leq 1)$

1. 4QCA 过程的变量赋值

Ragin^[34]通过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 运用隶属度将连续变量编码为 0~1 的区间范围。本文中对变量具体赋值时, 采用两类方式。第一类针对 Likert 量表的测量结果, 参照以往研究^[35,36], 采用三值锚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当受访居民打分在 4~7 时, 对应编码为 0~1 的隶属度分数, 其中打分值小于 4 时, 视为被访者不同意题项的表述, 即不隶属于测量潜在变量的集合, 赋值为 0; 分值为 7 时, 视为被访者完全同意题项表述, 赋值为 1; 中间值 5.5 为交叉点。需要对数据进行校准, 涉及到的变量主要有居民地方归属、地方依恋、居民参与、权力感知、旅游知识和居民积极感知。第二类针对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经济依赖度因素, 则采用 0/1 赋值, “是基本收入来源”编码为 1, “不是基本收入来源”编码为 0, 数据分析工具使用 fsQCA3.0 软件完成。

2 居民积极感知维度识别与题项开发

2.1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维度识别

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 将 67202 字的访谈文本划分为两部分, 分为探索性和验证性步骤^[37]。第一部分 (前 25 个访谈对象文本) 作为编码基础文本, 执行探索性功能; 第二部分 (余下 7 个访谈对象文本) 作为验证性文本。在探索性阶段进行三级编码, 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在这一过程中, 研究者对原始的实证材料进行分解、编码, 提取概念, 逐渐形成维度体系。当不再出现新编码时, 视为理论饱和, 完成探索性阶段。在验证阶段, 对余下的文本资料进行独立编码, 再与第一阶段编码进行对照, 确认无新编码。最终, 扎根理论分析共获得 161 个原始编码, 生成了 13 个概念化描述与 3 个范畴。进而, 以上述概念为基础, 以可读性、易理解性为原则, 编制居民积极感知的测量题项。

2.2 居民积极感知的题项开发

在问卷基础上, 本研究邀请两位参与者随机对问卷题项内容的针对性和清晰度进行初步评价, 在此基础上形成探索性问卷进行发放和收集。回收的有效问卷 Cronbach's $\alpha = 0.840 > 0.80$, 表明数据信度可靠。同时对数据进行 KMO 分析和 Bartlett's 检验, 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00, Bartlett's 检验值为 1409.435, 显著性水平为 0.00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删除因子载荷小于 0.50 的题项, 得到包含 10 个题项的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量表。

最后, 采用最大方差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得到了特征值大于 1 的 3 个公因子,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23.543%, 第二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21.720%, 第三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19.067%, 累积解释方差为 64.330%。结合内容分析, 对提取的 3 个公因子进行命名, 分别为“自我体验积极感知”“客观生活积极感知”和“社会质量积极感知”。

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前，首先需要检验数据是否符合常态分配，以避免对数据分析结果造成偏误。根据 Kline^[38] 提出变量分配的偏态绝对值小于 3，峰度绝对值小于 10 的标准，数据只有符合上述标准，才可使用最大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 来估计。结果显示，删除因素负荷量不符合要求的题项，用于分析题项的偏态值介于 -0.595~0.656 之间，满足绝对值小于 3；峰度值介于 -0.854~1.649 之间，满足绝对值小于 10 的标准。

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的值分别为 0.901、0.788、0.953、0.894、0.812、0.942，问卷的变量信度均大于 0.7，达到接受范围，显示问卷中的各因素变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各题项的因素负荷量介于 0.619~0.931，符合 Kline 提出的因素负荷量值不低于 0.6 的标准^[38]，且题项的测量误差不能有负值，同时达到显著的要求；组合信度 (CR) 值分别为 0.928、0.855、0.963、0.923、0.867、0.950，满足大于 0.7 的要求；平均萃取变异量 (AVE) 值分别为 0.721、0.543、0.813、0.705、0.570、0.658，符合大于 0.5 的标准^[38]。

效度检验一般是针对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收敛效度的检验通过 AVE 的值大于 0.5 即可获得通过。区别效度的检验主要采用 Fornell 等^[39] 建议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变量与对应变量的相关系数，则称变量之间具有区别效度，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区别效度，通过计算可以看出，结果满足区别效度存在的要求。

3.2 单变量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分析

在模糊集分析中，一致性表示变量解释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覆盖率表示必要条件。但由于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的对象往往因果关系复杂，在计算条件构型时难免出现误差。因此，Ragin^[34] 建议在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过程中可以进行 0.1 左右校准值的调整，不一定需要满足严格的子集关系要求。地方归属、居民参与作为单变量的一致性达到 0.9 以上，显示一致性较高，是实现旅游地居民积极影响感知的近似充分条件，其余单变量对旅游地居民积极影响感知均不构成充分条件。在必要性条件中，除感知权力和旅游知识外的各个单变量前因条件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的必要性均未超过 0.9。综上，所有单变量因素均非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影响因素的充要条件，不同单变量要素需要以条件构型的形式出现。

3.3 影响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路径组合分析

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矛盾组态，本文将 PRI 一致性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阈值设定为 0.75^[40]。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单项一致性均高于 0.75，符合要求。计算精简后共有 10 组充分条件构型，组合解的总体覆盖率为 0.934747，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84116，表示这 10 条路径组合能够有效解释 93.47% 的居民积极感知结果。通过对 10 条路径的解释力与要素组合分析，可发现其呈现为三大类逻辑，即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三大类逻辑在以周庄为案例地的居民积极感知中发挥着不同层次的作用 (图 1)。

第一类路径组合的原始覆盖率大于 0.6，包括路径组合 1 (居民参与*地方依恋*地方归属) 其原始覆盖率为 0.762737，能够解释 76.27% 的案例；路径组合 2 (居民参与*地方依恋*经济依赖)，其原始覆盖率为 0.641148，能够解释 64.11% 的案例。可以看出，原始覆盖率较高的两个组合均呈现出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组合，呈现出情感参与逻辑。

第二类路径组合的原始覆盖率处于 0.4~0.6 之间，包括路径组合 5 (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能够解释 59.40% 的案例；路径组合 6 (旅游知识*地方依恋*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能够解释 55.15% 的案例；路径组合 10 (旅游知识*居民参与*权力感知*经济依赖)，能够解释 48.46% 的案例。可以看出，该类组合均包含旅游知识与经济依赖的组合，即对旅游发展认知层面和对旅游发展的生活实用性层面的组合，呈现出认知实用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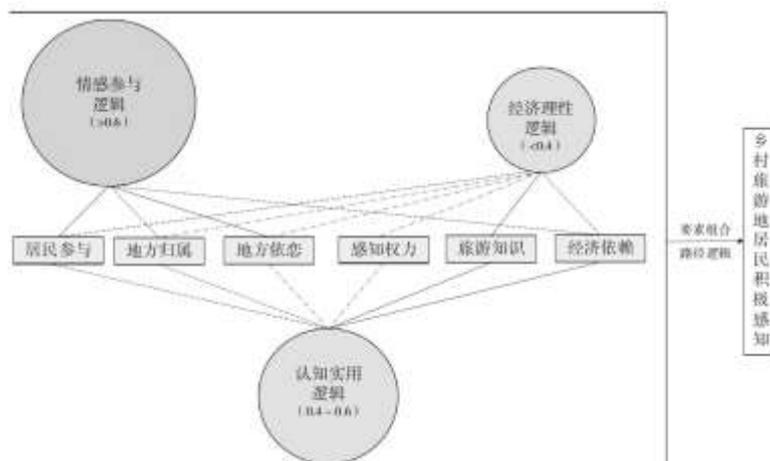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影响要素与路径逻辑

注：路径逻辑的圆圈面积越大，解释力越高。直线表示该逻辑中最重要要素；均匀虚线表示该逻辑中次要要素；不均匀虚线表示该逻辑中第三重要的要素。

第三类路径组合原始覆盖率小于0.4，包括路径组合4（ \sim 旅游知识*地方依恋* \sim 权力感知*经济依赖）^①；路径组合9（旅游知识*居民参与*权力感知* \sim 地方归属）；路径组合8（旅游知识* \sim 居民参与* \sim 地方依恋* \sim 权力感知* \sim 地方归属*经济依赖）；路径组合3（旅游知识*居民参与* \sim 地方归属* \sim 经济依赖）；路径组合7（旅游知识* \sim 居民参与* \sim 权力感知*地方归属* \sim 经济依赖），分别能够解释22.40%、15.81%、7.83%、6.06%和5.21%的案例。可以看出，该类路径组合均离不开经济依赖或旅游知识的其中之一，且大多“一定不包含”情感要素，例如地方归属和地方依恋，呈现出经济理性逻辑。

总体来看，在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生成过程中，三大类逻辑的作用呈现出不同层次，情感参与逻辑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认知实用逻辑其次，经济理性逻辑再次之。同时，路径要素中的居民参与扮演了关键角色，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一定包含”居民参与，而原始覆盖率最低的路径组合则“一定不包含”居民参与。同时，旅游知识在10条路径组合中出现了7次，频次最高，反映了认知层面发挥的中坚作用。最终，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均最高的组合是情感要素和参与要素的综合作用，并不一定需要经济要素的介入。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运用质性分析与模糊集比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案例实践，创新建构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概念维度，开发和验证了其量表；进而探索了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条件构型，阐明了具有较高的解释力的要素及其路径逻辑，为我国乡村旅游培育和维护居民积极感知提供了本土化、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第一，本研究探索了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提取了客观生活感知、社会质量感知和自我体验感知3大范畴共13个概念描述。以往研究中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和测量题项多借鉴西方研究，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我国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经验，同时以往的测量题项较为分散，不能精确、完整地描述居民积极感知的维度。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乡村旅游实践，采用扎根理论探索、问卷编制、题项验证的多重步骤，最终建构了包含10个题项的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本土化量表，以此量表为基础，本研究进行了基于fsQCA方法的目的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要素路径探索。

第二，在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和经济依赖6个影响因素中，虽然单变量因素分析中的地方

归属、居民参与、旅游知识和地方依恋都具有较高一致性，代表较高解释力，但是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必须以条件构型发挥作用。该结果说明，乡村目的地在提升居民积极感知的过程中，不可只依赖某单一要素，需因地制宜选择条件构型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积极感知。

第三，古村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的影响因素共产生了 10 个条件构型，可划分为三类逻辑，分别为情感参与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和经济理性逻辑，三大类逻辑在居民积极感知生产中发挥不同水平的作用。其中，具有最高解释力的情感参与逻辑呈现出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的组合，是具有高度情感特征的逻辑；认知实用逻辑包含旅游知识与经济依赖的组合，反映了居民对旅游发展认知水平和经济效益感知的综合作用；解释力最低的逻辑是经济理性逻辑，该类组合依赖经济要素，大多脱离情感要素影响。这一结论反映出，对于以周庄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旅游地来说，其居民积极感知的来源已经超越经济要素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居民能够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因此，目的地管理方在提升居民积极感知时，需加强情感要素的建构，例如通过设计促进主客情感交往的活动、拓展便于主客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间，提供公益性的东道主文化和知识培训，出台针对东道主居民的本地休闲观光福利政策等，要将作为东道主的主人翁感、获得感、认同感和责任感融入居民日常体验。

最后，旅游地居民参与和地方依恋在关键路径中扮演核心作用，强化参与机制和情感联系是提升居民积极感知的有效路径。以往研究已指出在扶贫旅游中居民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41]，但多指经济层面的参与，例如通过农村居民的经济参与与释放土地红利^[42]。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单纯的经济参与之外，更要重视提升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过程参与和情感参与，同时要注重发挥居民旅游知识的中坚作用。以往研究提出了旅游地政府进行居民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其满意度^[1]，本研究更系统地说明，要促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感知，要推进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提升参与过程的知识性，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生成和培养地方情感，才能高效提升居民积极感知，促进“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结论适用于新时期乡村旅游的恢复、转型与发展，目的地可根据自身需求因地制宜选择最佳路径。在后疫情时代，近郊乡村目的地成为人们旅游的优选，因此乡村旅游居民将接待更多元化的旅游者群体，要提升居民积极感知，目的地管理者需要从地方归属、地方依恋、感知权力、旅游知识、居民参与以及经济依赖等组合出发，为居民做好心理储备，提升居民和组织应对多元化游客的交往和交流能力，例如进行有关文化和交流的培训，增进居民的安全和应急知识，提升居民的归属、依恋感和权力感。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旅游者和居民对健康保障的要求都有所提升，因此在实现居民积极感知的过程中要考虑未来新生变量的出现，例如健全的疫情防控措施，健康服务系统和医疗设施的供给保障等。由于本研究调研时间在 2020 年 7~9 月，该时间段国内疫情防控成果显著，周庄旅游业重振有力，因此该时段的调研中居民对健康保障的关注并不明显，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近来疫情的反复使健康安全议题更加深入人心，因此未来在探讨居民积极感知构成和其影响因素时可将健康、安全保障议题进一步纳入框架，为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和乡村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 [1]朱晓翔, 乔家君. 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8):153-164.
- [2]黄和平, 孙晓东, 邢振华, 等. 古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获得感评价与影响机制——基于上海朱家角、港西、周浦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9):233-240.
- [3]王忠福, 张利. 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2010, 30(9):1563-1568, 1579.
- [4]郭安禧, 王松, 李海军.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J]. 旅游学刊, 2020, 35(6):96-108.

-
- [5] 龚箭, 杨舒悦. 可持续视角下自然遗产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神农架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6):54-60.
- [6] 韩国圣, 吴珂, 李辉.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J]. 世界地理研究, 2017(4):144-155.
- [7] Doxey G V. 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C]//Six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CA: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1975:195-198.
- [8]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Implic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5-12.
- [9] Ap J.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9(4):665-690.
- [10] Perdue R R, Long P T, Kang Y S. Boomtown tourism and resident quality of life:The marketing of gaming to host community resid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9, 44(3):165-177.
- [11] 陆林. 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1996(4):377-382.
- [12] 韩磊, 乔花芳, 谢双玉, 等. 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 资源科学, 2019, 41(2):381-393.
- [13] 汲忠娟, 蒋依依, 谢婷. 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 资源科学, 2017(3):396-407.
- [14] 张彦, 于伟. 旅游活动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以济南市两社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8):66-71.
- [15] McCool S F, Martin S.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3):29-34.
- [16] 杜宗斌, 苏勤, 姜辽. 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6):65-74.
- [17] 王兆峰, 向秋霜. 景观感知和地方依恋对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影响与分异[J]. 经济地理, 2020, 40(5):220-229.
- [18] Eusébio C, Vieira A L, Lima S. Place attachment, host-tourist interactions, and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The case of Boa Vista Island in Cape Verd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 26(6):890-909.
- [19] Luo J, Xiao H.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non-casino gaming in an urban destination:The case of Hong Kong[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Management, 2017, 6(4):335-343.
- [20] 韦瑾, 戴光全. 民族节事场域居民的权力感、主客交往意愿与节事支持度研究[J]. 旅游科学, 2018, 32(6):65-78.
- [21] Rasoolimanesh S M, Jaafar M, Barghi R. Effects of motivation, knowledge and perceived power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Application of Weber's theory in world heritage site destin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19(1):68-79.

[22]王纯阳, 屈海林.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4(2):278-288.

[23]Tsai C H, Wu T C E, Wall G, et al.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6, 18(2):152-173.

[24]姚海琴, 朋文欢, 黄祖辉. 家庭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11):169-176.

[25]新华日报. 周庄: 文旅融合赋能“中国第一水乡”[EB/OL]. http://xh.xhby.net/pc/con/202012/28/content_871572.html, 2020-12-18.

[26]Nicholas L, Thapa B, Ko Y. Residents' perspectives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pitons management Area, St. Luc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390-412.

[27]Glaser B G,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M]. Chicago: Aldine de Gruyter, 1967.

[28]徐冬, 黄震方, 洪学婷, 等.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10):2249-2267.

[29]何琼峰. 基于扎根理论的文化遗产景区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大众点评网北京 5A 景区的游客评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168-173, 139.

[30]Vis B.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fsqc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moderately largen analyses[J].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12, 41(1):168-198.

[31]张圆刚, 黄业坚, 余向洋. 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的组态视角研究——基于黄山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457-467.

[32]Haandrich L, Charles C. Rage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J]. Politische Vieteljahresschrift (Germ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0, 41(4):788-789.

[33]伯努瓦·里豪克斯, 查尔斯·C·拉金.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M]. 杜运周, 李永发, 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34]Ragin C C.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J]. Political Analysis, 2006, 14(3):291-310.

[35]刘宇青, 邢博, 王庆生. 旅游产品创新影响体验感知价值的构型研究[J]. 经济管理, 2018, 40(11):157-173.

[36]孙佼佼, 杨昀.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路径研究——以周庄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1):189-195.

-
- [37]郭文, 黄震方.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J]. 地理研究, 2020, 39(4):907-921.
- [38]Kline R B.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M]. New York:Guiford Press, 1998.
- [39]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39-50.
- [40]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1]张妍, 刘建国, 徐虹. 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21, 41(5):223-231.
- [42]解安, 吴练达.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释放土地红利——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下一个着力点[J]. 江淮论坛, 2019(6):68-74.

注释:

1 “*”是变量之间的连接符号, 表示“且”的交集关系; “~”表示“非”, 即“不存在”。